

浅论宋金时期河东丧葬习俗

□ 李 军

我国传统的丧葬,土葬较为普遍。但在宋金时期,我国却盛行火葬,而且,这种丧葬形式一直持续到元代。清初学者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卷15《火葬》中指出:“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,自宋时已有之。”^[1]据伊沛霞在《宋朝的火葬》和韩森的《宋代的买地券》两文中的估计,当时全国的火葬在10%~30%之间^[2]。而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区,宋金时期火葬亦蔚然成风。

我国古代的丧葬习俗,有土葬、火葬和土葬火葬结合三种方式。在丧葬方式上,女真人和北方汉人多以火葬,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用土葬,而在女真人居住之地又多是火葬和土葬相结合的方式。

火葬这种方式与我国传统的儒家丧葬观念相悖。儒家认为人死后应“入土为安”,火葬是人死亡之后的又一次杀戮,是极其残忍与大逆不道的行为。顾炎武谓:

“举其尸而界之火,惨虐之极,无复人道,虽量尤作五虐之法,商纣为炮烙之刑,皆施之于生前,未至戮之于死后也。展禽谓夏父弗忌必有殃,既葬,焚烟彻于上,或者天实灾之,然谓之殃,则凶可知也。”^[3]

因其残忍,故在汉人聚居的中原地区实行较少,而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较为流行。《周书》卷五〇《异域列传》记突厥人死后的丧葬方式云:“取亡者所乘马及经用之物,并尸俱焚之。”^[4]《北史》卷八二《契丹传》记载:契丹人死后,“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,经三年之后,及收其骨而焚之”^[5]。宋金时期,火葬在女真人和北方汉人中是非常流行的一种丧葬方式。元好问在《续夷坚志》卷三“吕内翰遗命”中,记吕忠嗣临终时对其子说:“我死无火葬,火葬是为戮尸,无斋僧作佛事,斋僧佛事是不以尧、舜、文、武、周、孔之教待我,有违我言者,非吕氏子孙,诸子从教,无一敢违者。”^[6]吕忠嗣的遗言从侧面反映出金代火葬之盛行。

虽然火葬一直以来被统治者所禁止,民众也认为是大不敬之行为,然由于受佛教和女真、契丹等少数民族葬俗的影响,北宋都城汴京和河东地区是当时火葬最为盛行的区域。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二三《官政治绩·韩稚圭》记载:“河东人众而地狭,民家有丧事,虽至亲,悉燔爇,取骨烬寄僧舍中,以至积久,弃捐乃已,习以为俗。”^[7]《宋史·凶礼》亦记:

“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,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,死则燔爇而捐弃之,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?甚者焚而置之水中,识者见之动心。国朝着令,贫无葬地者,许以系官之地安葬。河东地狭人众,虽至亲之丧,悉节焚弃。韩琦镇并州,以官钱市田数顷,给民安葬,至今为美谈。然而承流宣化,使民不畔于礼法,正守臣之职也。方今火葬之惨,日益炽甚。”^[8]

不仅汴京和河东流行火葬,而在陕西、山东、湖北以及南宋时期的两浙路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北等地火葬也非常盛行。《夷坚志》卷9《鄂州遗骸》记载:

“鄂州地狭而人众,故少葬埋之所。近城隙地,积骸重叠,多舆棺置其上,负土他处以掩之。贫无力者,或稍经时月,濒于暴露,过者悯恻焉。”

对此,朝廷以及一些地方官员都曾经下令禁止。建隆三年(962年)三月,宋太祖赵匡胤对火葬之风专门下诏曰:“王者设棺槨之品,建封树之制,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。近代似来,遵用夷法,率多火葬,甚愆典礼,自今宜禁之。”南宋时期,宋高宗赵构亦曾两次下诏禁止火葬。毕仲游在《乞理会河东土俗埋葬札子》中说:

“臣愿明敕本路守令,随其土俗,制为埋葬之法。务从省俭,但不焚毁,而棺敛藏诸地下,即可稍事华饰,非晋俗所能堪也。中民已上,如此以善意劝勉,勿纯驱以刑罚,使人人自葬其亲戚。下户无骨殖,即任从官园掩瘞。其间家力可以举葬,养

生勤 送死怠 安于故俗不从朝廷诏令 与州县条教 尚敢焚毁 或年岁深远不葬者 裁之以法 使于愧耻之外知有科禁 则河东不葬之俗庶几可革 存亡幽显各得其所 自然和气可召 风俗尤美。”^[9]

宋王朝为了禁止火葬 还制定了非常严酷的处罚措施。《宋刑统》卷十八“残害死尸”记：“诸穿地得死人 不更埋 及于冢墓熏狐狸而烧棺槨者 徒二年 烧尸者 徒三年 缌麻以上尊长各递加一等 卑幼各依凡人递减一等。”“若子孙于祖父母、父母 都曲 奴婢于主坟冢熏狐狸者 徒二年 烧棺槨者流三千里 烧尸者绞。”^[10]据《梦粱录》记载 同时朝廷及各级地方还为因为贫穷而没有地方埋葬的人设置了官园——漏泽园^[11]。

虽然 宋王朝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禁止火葬习俗 但由于佛教的盛行和民众的贫穷 火葬之风 依然非常盛行。特别是南宋时期 契丹、女真族的入侵 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的影响 火葬之风更盛。因而 这种风气不仅没有被禁止 反而一直持续下去。

宋金时期河东丧葬之风的盛行 是以贫穷的普通民众为主 只有少数的富人才能够遵循儒家“入土为安”的传统观念 予以土葬。现今河东地区发现的大量宋金时期的砖雕墓、壁画墓就是最好的证据。

稷山段氏墓群共发现有 14 座 清理发掘 9 座 分三排呈扇面形由北向南分布。墓室砖雕内容丰富 装饰华丽考究 雕刻技艺精湛 发掘报告称段氏家族为农村中的豪族地主。田建文先生在《马村砖雕墓与段氏刻铭砖》一文中 据新发现的段氏祖铭砖以及 M 7 北壁镶嵌的墓志铭《段楫预修墓记》考证^[12] 段氏祖先(砖铭中称大爷)段先为当地名医 凭借行医致富 后世代代以行医为业 世代积累 渐成当地富户 所以段氏后人在地下为祖先修建了这样一座令人羡慕的豪宅大院。

闻喜县小罗庄金墓共发现清理了 6 座 分布较散 也为南北向。发掘报告根据 1 号墓墓门右侧拱眼壁的墨书题记有“正隆”二字、2 号墓买地券上题“大定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歿故”和下款题名“李□品”以及 4 号墓出土的黑釉碗底上

的“李定谋” 推测这一墓群当为李氏家族墓^[13]。侯马董氏墓群相继发现并清理了董万墓、董海墓、董玘坚墓、董明墓等 4 座 这几座墓亦是仿木构砖雕墓 建筑华丽 装饰考究 雕砖技艺精湛 可以看出此墓的主人一定不会是一般的平民 发掘报告中称他们的家私“看来是不小的”^[14]。万荣、夏县、襄汾以及临近的河南焦作、洛阳、偃师等地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宋金墓 可见 河东以及和河东临近的周边地区风俗非常相近。

河东及周边地区 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也是我国最早开始农耕的区域 历代人众地狭。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家族仍然花费重金来购买土地 为自己的祖先及自己购置如此大的一块土地 可见其家底之殷实。这种风气也显示了宋金时期的厚葬风俗。

长期以来 史学界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宋金时期是一个崇尚薄葬的时代。然而 从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 可以证明宋金其实是一个崇尚厚葬的社会。

文献记载宋金时期的厚葬之风 实际上是上至帝王、各级官吏 下及普通民众共同形成的。《宋史》记宋仁宗、宋神宗等帝王都“厚葬过礼” 从而引起“公私骚然” 群臣上奏的情景。同样 皇室成员的丧事也是非常隆重 如《历代名臣奏议》记仁宗幼子豫王死后 仁宗下令予以厚葬 用“数十万工” 费资财五十万缗 于“中春卜地 盛夏启坟 凿土穿山”^[15]。在帝王的带动下 各级官吏也纷纷效仿 《夷坚志》卷一《王大卿》记平江太守王尚之死后 家人为其用五十万钱购买棺槨^[16]。在民间 这种现象也十分普遍 《夷坚志》记平江城北周氏之子死后 家人为其请僧道超度亡灵 “凡费钱十馀万缗乃窆亡骨于东庑 如僧式立塔 而绘其像 以冠裳为饰。”^[17]

发现的文物 也印证了宋金的厚葬。在河东所发现的宋金墓葬中 多为仿木构砖雕墓或壁画墓 墓葬除了精美的建筑之外 也有华丽而丰富的内容用以装饰。稷山段氏墓群和侯马董氏墓精美的建筑和华丽的造型 以及泥塑彩绘孝子图像 就是厚葬的最好证明。山西潞城县北关宋代砖雕墓 整个墓室不仅全部砖砌而成 而且四壁又用黑、白、红、黄等色横竖交错涂刷 东壁、西壁

和北壁雕刻男、女侍童,须弥座束腰部分雕刻孝子故事,同时还有瓷器、陶器等一些陪葬品,这样的墓葬一定不是普通的民众所建造。万荣县万和村金大定二十八年(1188年)砖室壁画墓,虽然不是仿木构建筑,但砖砌的四壁平整光滑,犹如青石板面,彩绘的壁画也非常精美。类似的墓葬在山西南部 and 河南的西北部都有发现。这些墓葬的主人生前的家境,今天尽管难以确知,但从这些墓葬可以看出他们的家境非常殷实,否则不会有如此豪华的墓室。

宋金厚葬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购买用以安葬的“风水宝地”。购买一块土地,在经济较为发达、土地紧张的地区决非轻易之事。因此,丧家要想购得一块可以葬自己先辈的土地,就不得不花费巨资,这对官僚富裕之家,应该不是什么问题,而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就非轻而易举之事了。人众地狭的河东地区,一个普通家庭就更难承受,所以河东地区在宋金时期火葬较为盛行。在河东地区发现的墓葬中,侯马董氏墓、稷山段氏墓群、闻喜小罗庄墓等都发现了买地券。从买地这一事实,即可看出这些金墓的主人均是一些当地较为富足之人。

[1][3] 顾炎武著,栾保群、吕宗力校点《日知录集释》卷15《火葬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。

[2] 见邓广铭等主编《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》,河

北大学出版社,1992年。

[4] 《周书》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910页。

[5] 《北史》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3128页。

[6] 元好问《续夷坚志》,姚奠中主编《元好问全集》(下),山西人民出版社,1990年,第352~353页。

[7] 宋·江少虞《宋朝事实类苑》(上)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,第375页。

[8] 《宋史》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2917页。

[9] 毕仲游《乞理会河东土俗埋葬札子》,黄淮、杨士奇编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116《风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。

[10] 薛梅卿点校《宋刑统》,法律出版社,1999年,第327页。

[11] 《梦梁录》,《东京梦华录》(外四种),文化艺术出版社,1998年,第286页。

[12] 田建文、李永敏《马村砖雕墓与段氏铭砖》,《文物世界》2005年第1期。

[13]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、山西省闻喜县博物馆《山西省闻喜县金代砖雕、壁画墓》,《文物》1986年第12期。

[14] 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《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》,《文物》1959年第6期。

[15] 黄淮、杨士奇编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一二三《礼乐丧礼》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217页。

[16] 洪迈《夷坚志》卷一《王大卿》,中华书局,1981年,第975页。

[17] 洪迈《夷坚志》,中华书局,1981年,第984页。

(作者单位:山西省运城市民俗博物馆)

(上接43页)

[8] E.N.Chernykh: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, Transl. by Sarah W. right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2.

[9] 切尔内赫《欧亚大陆草原带畜牧文化的形成过程》,《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:塞伊玛-图尔宾诺现象》附文一,中华书局,2010年7月,251~268页。

[10] 春城秀尔、今村峰雄编《弥生時代の実年代:炭素14年代をめぐって》,学生社,2004年。

[11] Evgenii Chernykh, "Ancient Metallurgy of Northeast Asia: from the Ural to the Saiano-Altaï", In: Metallurgy in the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 to the Yellow River,

Katheryn M. Linduff edited. New York, 2004, p. 19-22.

[12] 林沅《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》,《林沅学术文集》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98年,271页。

[13] Elena E. Kuzmina: The Origin of the Indo-Iranians, Boston, 2007.

[14] Philip L. Kohl, 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7, 20-21.

(作者工作单位: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)